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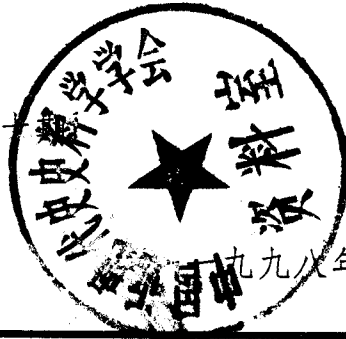
1104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二



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日

目 录

- 嘉兴兰台药局店史 陈建华(1)
- 解放前嘉兴县新闻界出版活动情况 郭士新(6)
- 地委党校在嘉兴的岁月里 沈 骥(15)
- 发展中的嘉北信用社 杨永生(23)

嘉兴兰台药局店史

陈 建 华

嘉兴兰台药局为清代名医徐大椿所创。

徐大椿(1692——1771),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为清乾隆年间名医。他博学多才、精于医术,曾两次奉乾隆帝之召入京治病。一生多有著作,其中《兰台规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类方》等在我国众多的医药典籍中亦有一定影响,尤以《用药如用兵论》一文,更是今天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人必读之作。

很久以来,中药店、铺、堂名为取吉利之意,店名中含仁、寿、德、泰、春、葆等字为多,如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上海童涵春、蔡同德,杭州胡庆余堂,其他如济寿、泰山、长生堂等亦一目了然。而兰台药局之“兰台”二字却让人不好理解。那么“兰台”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曾向兰台药局的最后一任私方经理夏祥尧先生(1904—1984)询问。据夏先生回忆:徐大椿的晚辈徐貽声曾对他讲,先贤徐大椿奉天子之召赴京替人治病,因其医术高明、精细,乾隆帝意留徐大椿在宫中为医,并赐他于“兰台”居住。“兰台”乃宫中藏书之地,徐大椿在此阅读和抄录了大量医药经典和宫廷秘方,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学识。徐大椿开创药局以后,念自己奉天子之召入官居于“兰台”之处,遂取“兰台”二字为药局店名,自此以后“兰台”药局便相沿至今。为证实“兰台”二字确切意思,我查阅过《辞海》“兰”字条下,见注释:汉代宫内藏图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

EB 12/52

因称御史台为兰台。又东汉时班固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辞海》的这一注释与夏祥尧先生生前对我讲“兰台”二字的意思是相吻合的。

兰台药局始创于清乾隆年间，这是浙北地区群众所尽知的，但确切年份已无史料可查。据清代小说家袁枚所撰的《徐灵胎先生传》记述，徐大椿首次奉乾隆帝之召替大学士蒋文公治病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居京四月余，便执意回归故居——今吴江县，一边继续行医、一边著书。第二次应召入京则是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此时，徐大椿已79岁，体衰多病，自知难以生还，在子徐熾陪同下载着棺材同行，抵京之日即故。按此推算，药局的创建当在徐大椿两次奉召入京之间，即清乾隆二十五——三十六年（1760—1771）之间，因而兰台药局最少也有220多年历史了。

徐大椿为清代名医，为何还要自设药铺？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医药常为一家。又据《浙江中医》杂志1984年第5期陆文彬先生所作《徐大椿与兰台药局》一文所述：“目睹当时不法药商牟利损人，耽误病家，遂择古运河畔的嘉兴开设兰台药局”。另据嘉兴建设街道编写的《地名录》载：兰台药局之前身叫大年堂药铺，始于明代，初设东门大年堂，后焚于火。徐大椿重建开设“兰台药局”迁至城外闸里街。当时闸里街店铺林立，人群鼎沸，热闹非常，又水陆相邻、交通便利，故药局生意颇为兴旺。洪杨年间，太平军到嘉兴，清军败退，往日热闹的闸里街成一片废墟，药局也焚于火。以后兰台药局迁到西河街（今解放路），可惜这两处兰台药局的早期遗址，今已无踪可觅。到上世纪末，嘉兴城的商业繁华地段已属北门大街和塘湾街一带。“兰台药局”约在此时搬迁到了北门大街一座石库墙门

内(即今建国路 325 号),此处经营直至解放后的 1957 年。

兰台药局创建出自名医高手,而且当年徐大椿开设药局本为针贬不法药商,以济世存仁,故店内每至盛夏酷暑,就以防暑解暑的“天中茶”,清热解毒的“陈金汁”免费供百姓服用。医药为救人之道,药局自创以来,店内规矩甚严,凡进而从业者,必先熟读《药性赋》,以后又必读徐大椿的《兰台规范》。药材炮制加工、制剂均有人专门传授,管理有条不紊,要求一丝不苟。不过,在我 1965 年进入药局工作时,已无人指教我要阅读《兰台规范》。但在“文革”中,我却意外地发现了兰台药局唯一留存的一套四册八卷线装本《兰台规范》,而且我终将把它保存了下来。

兰台药局内另有一副“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的楹联,以训诫店人,传世后代。还有“真诚谨慎”匾额一块,作为药局操作人员的座右铭。虽此匾真迹已无,但至今兰台药局仍将此四字高悬店堂百眼橱上,以示店人调配处方必须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谨慎操作,一丝不苟。

历来,中药店、铺都为前店后坊,药局前半部为营业店堂,后半部为仓库、作坊。中药的加工炮制,对中药饮片质量优劣至关重要。听药局的老师傅讲,在兰台药局的炮制加工场所,专门立有一块“葛洪流辉”的匾额,以示加工炮制不忘遵古依法。故自古以来,兰台药局的饮片加工规格十分讲究。不同药材、不同品种由不同等级的刀上师傅操作。中药切片按技术高低分为头把刀、二把刀、三把刀。头把刀专切贵重、精细药材,如天麻、川连、白芍、附子等。药界有句行话“槟榔一百零八片、附子飞上天”就是形容“头把刀”的刀上功夫。一只直径 2 公分的槟榔可切出 108 片,片片完整、薄如蝉翼。“附子”切出的片,稍一吹即可飞至半空。这些饮片不仅洁净美观,而且容易煎煮,使药效充分发挥。二把刀则切较粗一些的药材,而三把刀就只能切一些藤木和草类药材了。饮片的片型、厚薄须视

不同药品而异,故兰台药局的饮片有口皆碑。兰台药局自创以来,一贯以地道药材,遵古炮制,精细丸散,取信于民。如采购药材,陈皮要以广东新会;地黄、山药必须用河南怀庆;川贝专以四川松藩;党参要以山西潞州……,宁可价贵绝不用劣货而毁药局信誉。

百多年来,兰台药局承袭徐大椿抄录的太医院方加本人经验积累校正为传统配本,合造各类丸、散、膏、丹与他店屡有不一之处,别具特色。如兰台药局秘制的“安息葆元贡带”,以安息香、麝香、鹿茸、肉桂、丁香、祁艾等名贵中药,精心配伍,再将药物研磨成末,夹置于绸缎制成的束带或背心之中,束于腰部或缚于背上,奇香馨人,药力渗透肌肤,入以脏腑,有温阳暖宫,葆元镇痛,和气养血之功。据传,当年曾作贡品,故名“安息葆元贡带”。此物到解放前夕还有制作,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制作失传。而我也仅能从夏祥尧先生及其他几位兰台药局的老药工处听到。但我保存的一张尺余见方、红纸黑字、石印制成,刻有“浙嘉兰台药局”详细介绍的“安息葆元贡带”说明书,则足以说明兰台药局秘制的“安息葆元贡带”确有其物。另有兰台药局所制“青宁丸”,以大黄辅以其他数十味中药经二十四次蒸制,再将吃透药汁的大黄研末,水泛为丸,具泻肝火、通二便、清湿热之功效。因其制法考究,药力和顺而功力颇佳,尤适宜老人小便赤黄、大便干结者服用,故有兰台药局“廿四制青宁丸”之称。此外如“廿四制金柑”、“太乙神针”、“玉液金丹”亦都以兰台药局的传统配本精细制成,功效显著。百多年来,在江、浙、沪国药同药业中,清代名医徐大椿开创的百年老店——兰台药局可谓遐邇闻名。

兰台药局历史悠久,但在旧社会却因为种种原因发展缓慢,到解放前夕,药局的年销售也仅为数万元而已。在1953年工商登记时,资金也仅三万多元。50年代初,兰台药局的丸散加工生产,规模曾有较大发展,一些品种的客户远至关外。1956年公私合营后,

嘉兴国药业的经营、生产、加工方式有了较大变化，商店只管经营，加工炮制集中统一，兰台药局百余年来前店后坊式的经营方式也不复存在。不过此举从实践来看，也未必有益无弊，尤其是对继承、发扬像兰台药局这样的名牌老店的传统特色。

1958年，兰台药局搬迁到嘉兴市区勤俭路中段一座占地约300平方米的二层新楼。经营范围扩大，品种增加，除传统的中成药外，又扩大了西药和化学试剂、医疗器械，成为一家综合型的中西药商店。一些外地顾客常常慕名来到兰台药局购药配方，中药配方最多时，每天处方达300余张、1300余剂，为解放前兰台药局中药配方量的四、五十倍。

“文革”中，兰台药局也未免遭厄运，店中一些百年之久的瓷器、药瓶因有涉古之嫌而遭“粉身碎骨”，荡然无存。店名“兰台”也因古之沿袭，自然不得复存。先是易名为“嘉兴中西药店”，后改为“勤俭药店”，至1983年又改为“兰台药店”，直到1985年才重新恢复“兰台药局”的店号名。近年来，兰台药局的销售业务有了大量增长，1997年销售达到563.5万元，实现利润44.47万元，成为全市医药零售业中的佼佼者，连续几年被嘉兴市物价局和技术监督局授于“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199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授于“中华老字号”称誉。

如今，这家有着22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药店的全体人员，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百年老店更显本色。

解放前嘉兴县新闻界出版活动情况

郭 士 新

地处沪杭铁路线中心的嘉兴县,是个文化昌盛、人文荟萃、物产富饶的鱼米之乡。解放前,虽因反动统治及其社会制度的限制,新闻事业不甚发达,但在艰困中还是存有各种形式的新闻力量,起着促进社会变化的作用。

远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嘉兴县已有两张铅印的日报:一张是《嘉区民国日报》,另一张是民办的《嘉兴商报》,直至嘉兴县沦陷后而停刊。在日军统治下的汪伪机构,曾在嘉兴城内的塔弄出版《民国日报》,是为美化日本侵略军及汪伪政权而唱赞歌和粉饰太平的。当时在嘉兴城外的国民党游击统治区,也出版了油印刊物《嘉兴人报》,是由国民党的教育界人士沈宗堦等人主办的。

解放前出版的报刊杂志概况

抗战胜利以后,国土重光。战前原有的国民党机关报《嘉区民国日报》接收了敌伪产业《民国日报》的社址与印刷设备,于1945年9月复刊。《嘉兴人报》迁城以后,就与《嘉区民国日报》合并出联合版(以下简称“联合版”),以国民党嘉兴县党部书记长王梓良为发行人兼社长,李馥承为副社长兼总编辑。当时已任嘉兴县立中学校长的沈宗堦仍为《嘉兴人报》社长,但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了,目的是为了有个报名可以获得一份平价分配的白报纸。联合版复刊初期,为四开二版的日报,半年以后即扩版为对开四版的日报,设

有电讯设备及通讯网组织,发行量保持在 1000 份以上,最高发行量在 1500 份左右。先后在联合版担任编辑的有褚克昌、熊牧等人,采访股长张勉(圣沫)兼编地方版新闻;先后担任过记者的有张旭曙、李修齐、闻鑫镛、徐可人、闵一、唐戌中等人,编采人员阵容较为充足。该刊直至解放前夕停刊。

《嘉兴商报》创刊于 1934 年,是由国民党人士陆初觉创办主持的。抗战胜利以后,在张木舟、孙定扬、顾速明等人的倡导发起下,筹备复刊。1946 年元旦正式出版发行。复刊后的《商报》,由后来担任嘉兴县参议会议长的张木舟为发行人兼社长,以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黄桐生为副社长。报社专门设有董事会组织,以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褚凤章为董事长,商会理事长顾速明、商会常委蒋抚青、孙定扬、郑志巩等人为董事,负责筹措资金及决策重大事务。由于民办性质沾不到接收敌产的光,所以条件很差,没有固定社址,复刊初期附设在下塘街的县商会内,以后固定迁入张家弄的寄园内;甚至连印刷排字房都没有,只能商借《嘉兴人报》的排印设备,付费承印。发行量保持在 1000 份左右,常有涨落变化。每当县参议会三个月召开一次大会,《商报》大量报导县参议员向当地军政官员提出的尖锐质询,发行量就会激增。

《商报》复刊初期,也是四开二版的日报,在县内外各乡镇聘有通讯员,设有简陋的新闻电讯设备,自己收报、译电。初由陈剑雄主持编务,编采人员稀少。在联合版扩版以后,《商报》也相继扩展为对开四版的日报,但在联合版重浇新五号铅字时,《商报》想浇却无力实现。扩版后的《商报》以周一弘为总编辑,陈剑雄为副总编辑兼采访股长,分编地方、新闻版。《商报》先后担任过编辑的有杨意行、

叶飞鹏、章煌等人，记者有郭士馨（先专职，后兼职）、钱家农等人。复刊初期的编辑张春波，是旧式的文人，标点符号都不善使用，新闻末后定要拖个“云”字，文体模式化，语句呆滞刻板，扩版前已被淘汰了。一般来说，《商报》的编辑、记者的学历都不高，工作却很卖力，敢于讲话。《商报》至嘉兴行将解放时停刊。

1946年，在嘉兴出版的报刊，还有一张名《通讯夕刊》的八开四版的类似于夜报的报刊。发行人兼社长陈乃斌，原是嘉兴县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后来选任为县参议会副议长。总编辑金信正，编辑汪琪，记者张其贤。内容着重于地方上的社会新闻及趣味性的副刊，发行量仅有数百份。以后该刊改名为《国民日报》，篇幅扩充为四开二版的日报，新闻有所增加，但报刊的特色还不如《通讯夕刊》活泼、生动，先后任用了张冬心、姚永丰、张甫文等人为记者。《国民日报》出版了两年左右，终因经费不足，发行量少，从1948年1月保留报名，人员被并入联合版工作。

此外，在嘉兴城内冷仙亭2号，还设有一个《嘉兴通讯社》，成立于1946年春季，专以采访地方新闻为业，采编油印后分送各报刊选用。该社的社长是县参议员谢廷琦，董事长是嘉兴县政府民政科长朱秉钧，由他利用职权向县属各乡镇公所募集经费维持。社内早期的编辑郭士正，记者金亦、张其贤、许顺珠（义务职）等人。以后谢廷琦通过筹组民社党，拉拢嘉兴团管处司令吕钦璜，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到一笔钱，在1947年出版了四开二版的《嘉兴明报》，自任社长，社址迁移到中山东路的台属同乡会馆。以高寅为记者，聘约兼职编辑，编采力量薄弱，经费与设备都很贫乏，发行量少，不足周年就夭折了。

嘉兴县新闻界在 1946 年可谓繁盛时期，其时正当竞选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期间，竞选者纷纷笼络新闻界人士，捐款相助，设宴请客，不一而足。这时全县除了拥有四张日报以外，还由陈剑雄、郭士正为主体，编印并出版的《南湖月刊》。这是一份十六开装订的铅印杂志，内容有嘉兴的历史掌故、风俗习惯及名胜古迹的景色与沿革，当地特有的海（船娘）、陆（妓女）、空（风流尼姑）的桃色逸闻，以及诗、词、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出版了四期，因被浙江省警保处以未曾核准登记为名勒令停刊。

另有一张引起社会注意的八开四版的不定期刊物叫《嘉兴评论》，是由嘉兴旅外同学会主办，由计士雄、许大钢等人编印出版。内容是评击时政，揭露当地官吏贪赃枉法行为。刊印数量不多，不公开发行，出版无定期，印后免费分发各机关团体及文教界。曾使政府的军、政官员胆战心惊，出版数期突然停刊。停刊原因没有公开宣布，外间传闻有说是政治压力，也有说是受到经济诱力所致。还曾编印出版过十六开杂志式的文艺刊物《禾报》，编辑人胡冰。因为寿命短，发行量少，影响很小。

出版报刊的特点及其内容评介

综观解放前嘉兴县出版的报刊，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六个特点：

（一）报社从业人员很少，工作要兼理协作。整个报社的编、采、校及电讯收译人员，联合版共有十余人，《商报》社仅能坐满一桌，《国民日报》与《明报》的人员更少。

（二）同行间业务对立，工作上不通声气，彼此为了抢夺新闻的速度与时间，宁可各设电讯收译。地方新闻的采访，也是互相封锁

新闻来源。

(三)各报都聘有特约记者或通讯员,但都没有发挥通讯网作用,平时也少联系辅导,形同虚设。

(四)各报虽都设有副刊,但都不甚重视。社外投稿很少,刊出的质量也不高。报社根本付不出稿酬,只能免费赠阅数张报纸为酬。

(五)为了增加收入,各报所刊的广告太多,一般要占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一,报刊的发行量却难以扩大。

(六)普遍的通病是求量超过求质,求快少考虑效果,版面大同小异,缺少特色。报纸的校对工作不够认真,误排的错漏字常有发现,甚至有一次发生过“大使”被误印为“大便”的荒唐笑话。

旧的新闻观点叫“有闻必录”。记者凭着自己的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刊录报导,少考虑效能、作用及其后果,缺少政治上的严肃性。当时各报的国内外新闻主要是收录当时中央社的电讯,也有路透、合众、美联社等国外通讯社的电讯,由编辑加上标点符号及标题付印。当地新闻都由记者采访编写。经济新闻以报导商业行情,介绍市场物价升降、变化及未来动向。地方新闻以传播当地各机构发布的文件、会议与动态,新任或路过的军政官员发表的施政方针、采取措施与善后处理意见,听取军政要员谈论视察观感及其印象。社会新闻报导当地及邻县发生的奸、杀、抢、偷、烧、拐、赌、诈等社会现象,法院与警察局的民刑案件,以及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民丰造纸厂与东栅居民的黑水纠纷;人力车工人与三轮车工人殴斗事件;昙花开放及发现木乃伊等偶发事件,即是地方报刊的主要内容。

联合版重视政论，专门组有“社论编审委员会”，由社长王梓良亲自掌握，以李馥承、沈宗堙、褚克昌、袁耀祥等人为委员，负责编写和审查报纸的社论（《商报》与其他两报无此组织）。联合版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社长王梓良是国民党嘉兴县党部书记长，他对报纸控制严格，亲手写社论，亲自审阅重要稿件，有时还亲阅清样。有次我偶然看到他在一篇稿件的天格上亲笔写有“撼不是憾”数字，足见他对报纸的态度是认真细心、极端重视的。

而《商报》社长张木舟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对编务几乎是不问不闻，遇到重要节日或是发生重大事件要写篇应景文章，他就通知报社总编辑或是县参议会秘书代写，写好后他连看也不看，署上他的姓名就发表。由于社长不顾问编务，使《商报》的编、采工作有了较大的灵活、自由，比较敢于代鸣不平，能够支持正义行动，经常刊出县参议员或乡（镇）民代表们指责的征粮、抽丁流弊及其他欺压群众情况。在我记忆中，《商报》发表过类似报导，就有揭露当地流氓恶棍调戏女学生，标题是《癞蛤蟆休想吃天鹅肉》；刊出县参议员吴棣香揭发税捐处舞弊肥私，标题是《不要税捐稽征处》。我在《商报》担任记者期间，曾先后发表过《形形色色话竞选》、《辛酸话蚕农》、《荡农请愿始末》等通讯特写稿，抒发了我所看不惯的流弊，伸诉了农民群众的疾苦。

新闻界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1946年2月间，各报社头头策划组织的“嘉兴县新闻记者公会”成立，选出理事、监事，组成理、监事会，以王梓良为理事长，张木舟为监事长，作为一个法定的“法团”。凡是当地的新闻从业人员，包括经理部的广告事务人员在内，都可申请加入。遇到选举县参议员和国大代表，都按比例有名额分配。这个组织主要由报社头

头操纵,除了在重大问题上发表政见或文告,推选代表参加其他法团活动、审查申请入会者的资格以外,对改善新闻职工们的生活条件毫无关联。

各报社的编采人员对记者公会不抱希望,酝酿筹组自己的组织。就在同年三四月间,在铁路苗圃(即现人民公园)集会,宣布成立“嘉兴县外勤记者联谊会”(简称记联),公推金信正为干事长,选出陈剑雄、熊牧、汪琪、郭士馨等四人为干事,分工兼任总务股、学术股、福利股、联络股的股长。组成以后,总务股洽借了社会公寓(由嘉兴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傅锦炜开办的旅馆)的房间为“记者之家”,作为文娱休息场所。联络股商请私营银星影院义映美国彩色歌舞片《出水芙蓉》以筹募经费,并向水上警察局借得机轮,集体访问了海盐与沈荡镇。

“记联”义映的影片轰动了市民,观众拥挤,记者亲临影院收票,第一次在嘉兴杜绝了无票入场看戏。解放前军警宪特人员从来不买票看戏,有身份、地位的官绅们也以无票观戏为荣。这场破天荒的凭票入场的义映,引起了当地群众强烈反响。就在第二天夜场收票时,一群伤兵拒绝买票硬要入场,被收票记者拦阻,双方发生了冲突。伤兵殴辱了收票记者徐可人和郭士馨。我穿的新衬衫竟被撕裂得粉碎。在场维持秩序的浙江省第十区保安司令部士兵,扬言要开枪弹压,后为银星影院老板所劝阻。

“记联”组成半年左右,扩大改组为“编辑记者联谊会”,增加了会员,选出周一弘为干事长,陈剑雄、金信正、张勉等人为干事。组成后曾在少年路鸣阳门建有三间平屋,发动推销房屋义卖奖券筹措经费。从组成到1947年,集体访问了平湖县与乍浦镇,以及邻县嘉善、海宁等地,经过交往联系,开始酝酿筹组嘉兴专区(旧名浙江省第十区)七县的编辑记者联谊会,进一步扩大入会的成员。

自从专区七县新闻界推员进行筹备,至1948年春季,借用国

民党嘉兴县党部大礼堂，举行了“浙江省第十区编辑记者联谊会”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嘉兴、嘉善、海宁、海盐、平湖、桐乡、崇德等七县的编采人员，推选张勉为干事长，各县均推选代表参加干事会。然终因成员扩大、分散，不易集合活动，加上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局面影响，因而降低了活力与作用。

《今日晚报》的出版及旧报人的归宿

自从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后，形势已促使嘉兴县的旧报人醒悟过来，纷纷向左靠拢。大家认定国民党政府苟延残局的时间不会太长，普遍愿意为迎接解放做些工作。编采人员认为，县内原有各报都是国民党显要人物所办，解放后肯定不会出版，所以会同商议数次，准备筹办一家同人报社，作为过渡时期的新闻出版物。商议结果，决定筹组“今日出版股份公司”，以五斗大米为一股，认股后预收半数，策动大家分头募股筹款。最初的发起人是陈剑雄、褚克昌等人，推定嘉兴县参议会秘书曹博文为主持人。确定先在嘉兴出版一张四开二版的《今日晚报》，以后有条件还打算出版文艺刊物。

《今日晚报》于1949年4月下旬出版，时间是在苏州解放前八天。出版之日既无经费，也无专职人员，完全是白手起家。当时募股所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曹博文与我商议后，决定动用县参议会为编印大会会刊所囤购的白报纸，暂先刊印出版。所有的编、采工作，由原来的联合版和《商报》的编辑记者兼办，新闻来源不仅收取中央社的电讯，还私听新华社的广播报导，改头换面地刊印出来。就在出版第八天，根据新华社广播所编刊的苏州解放消息，赫然列入头版头条新闻。报纸散发出去，震惊了县、乡群众。驻守在建国北路百货大楼里的嘉兴县城防指挥部，立即派出军警，以“造谣惑众”的罪名，用暴力封闭了《今日晚报》，使这张新生不久的刊物就此夭折。

在嘉兴解放前二年,新闻界已有郭士正、郭士馨兄弟俩掩护和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工作,闵一在《苏州日报》也与地下党员有所接触。解放以后,各报社的从业人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商业、企业工作,也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其中《商报》的郭士馨,海盐报社的王坚,海宁报社的扬树生和铁风,嘉兴秀州中学的陈有为,都报名考入了中共华东局举办的“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在部队或地方党报担任编辑、记者工作。《商报》特约记者姚人为也参军从事政治工作。

由于新旧社会的世界观迥然不同,旧报人必须彻底地转变立场、观点,不断地改造思想,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为祖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我在入伍以后,对此深有体会,曾在征得部队报社领导同意后,将原名“士馨”改为“士新”的现名,其含意是“旧读书人立志改造成为崭新的知识分子”。这不仅表达了我个人的夙志,也可以代表那些愿意追求进步,真诚地为新中国革命事业积极工作的旧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意。

(1986年9月1日撰写)

地委党校在嘉兴的岁月里

沈 骥

—

中共嘉兴地委党校是于1959年5月经中共嘉兴地委报请省委批准,由中共嘉兴地委干部学校改名而来。如果向上追溯,其前身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创建于1949年5月的湖嘉公学,因而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当时校址尚在嘉兴,1962年1月才从嘉兴迁至湖州。而我则是地委党校的一名理论教员,距今已三四十 years 了。但回想起地委党校在嘉兴的岁月,仿佛仍是眼前的事。

1958年12月,我从吴兴县教育系统被抽调去嘉兴地委干校,参加为期一月的短期培训班,学习共产主义原理。在学习班结束前,校部以个别谈话的方式通知我:已征得组织同意,留(调)我在干校工作。这一突兀的消息,毫不夸张地说,是我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我的心情是在喜悦之余,带着几分胆怯。能力与水平自己有数,地专一级的干部教育工作,真怕胜任不了。现在组织上既已作出决定,前提当然是服从。1959年2月调入地委干校不久,于同年5月改名为地委党校。在三四个月的时间中,我接连发到干校和党校两只工作证,至今仍保存着。

地委党校座落在嘉兴北门端平桥光明街一号,右面已“此路不通”,对面与中丝一厂隔河相望。光明街一号是个大院子,院内建筑物原是一所文生修道院,属天主教系,完全是教堂的建筑风格。它

是供修女居住的。用它作党校校舍，形式和内容之间看来很不协调，格格不入。然而形式落后于内容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何况处于革命胜利后的五十年代，它反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人们的不以为然，也就不足为奇了。院内树木很多，参天般的樟树成行，房屋全在绿荫之中，环境显得幽雅清静。虽然室内光线欠佳，但在灯光下不失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党校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体制，吴献祥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王星三任副书记，党委委员均为各科室负责人（正副主任、科长）。校部设办公室（下设行政科、医务室、文印室）、教研室、组织科等主要科室，共同担负着干部的理论培训和文化补习两方面的教学任务。其教学人员相应地分别配置，理论教员和文化教员泾渭分明，校内有理论部和文化部之分，除文化部有少量政治理论课由理论部教员讲授外，平时双方在教学业务上很少联系。

二

地委干校改名为地委党校，这一字之别，充分地反映了党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加强，而加强的具体体现，莫过于教学人员的迅速增多。1959年，党校通过各方渠道充实和增加人员，特别是理论教学人员的增加。其来源：一是从建德地委干校转来的（因建德地委建制被撤销）；二是从杭州大学政治专修科调干生中调入的；三是从机关有关部门调入的；四是从培训班学员中留下的（与我一起留下的共三人）。一下子增添了十五六人。时值高举“三面红旗”之际，各项事业都在讲“大跃进”，党校开创了人丁兴旺、规模空前的新局面，也是适应新形势之举。

为适应干部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通过组织机制，短期内增加